

· 资讯 ·

重申持牌经营 部分支付机构被约谈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吴限)跨境支付业务遭遇强监管。7月15日,有消息称,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日约谈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要求支付机构6个月内停止与不合规的无证跨境支付公司业务合作,一位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值得一提的是,相关跨境业务机构近日纷纷做出反应,例如,PingPong表示,近期开启了业务模式的升级计划,鼎付Gleebill表示暂停亚马逊欧洲、英国等店铺的收款服务。分析人士指出,研讨会的召开意味着监管对跨境支付业务清理整顿工作拉开大幕。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支付业务本身属于持牌业务,跨境支付作为支付业务的一个分支,持牌经营是基本要求。此次研讨会重申跨境业务持牌经营,是此前支付机构名录登记工作的延续,意味着监管对跨境支付业务清理整顿工作拉开大幕。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消息发布后,关于PingPong、鼎付Gleebill、Payoneer等尚未取得国内跨境支付牌照的公司业务被叫停或将退出国内市场的声音层出不穷。

业务模式升级是否意味着业务被叫停?对此,7月15日,PingPong在官网发布严正声明称,近期网络上传播不实信息,已经导致社会公众对跨境支付行业产生严重误解。为此,该公司强调,自成立以来,公司业务符合政策法规,不存在叫停一说。

PingPong客服人员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此次升级是央行对全行业的要求,在升级过程中对于日常入账、提现等业务没有任何影响。该客服人员进一步指出,公司具有境外支付牌照,正在申请境内相关牌照,而监管最新规定只是一个警告,并没有明确提到要持有国内相关牌照。

对于Gleebill不再提供亚马逊欧元等店铺收款服务的原因,北京商报记者多次尝试联系该公司客服,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6月末外汇占款环比减少61.92亿元 已连续11个月下降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任利)7月15日,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6月末外汇占款212455.2亿元,较5月环比减少61.92亿元。

自2018年7月以来,央行外汇占款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6月则是连续11个月下降。自2018年7月的215301.95亿元减至6月末的212455.2亿元,总计减少2846.75亿元。

外汇占款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首先是估值效应,第一个估值因素来源于美元汇率和美元指数升值和贬值的影响;另外一个估值因素是债券,来源于投资的收益,温彬表示:“如果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降,那么债券的价格会上升,这样债券的估值就是正的。所以要结合这两项来进行综合判断”。

第二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带来的结售汇影响,温彬指出,如果人民币在一个贬值的压力背景下,结售汇就可能会出现逆差,逆差的出现也会影响到外汇占款的减少。

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2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5月,银行累计结汇50461亿元人民币(等值7460亿美元),累计售汇51381亿元人民币(等值7599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逆差920亿元人民币(等值139亿美元)。

平安基金率先发布二季报 投资主线聚焦消费龙头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刘宇阳)距离二季度结束仅半个月,公募基金二季度报告披露即拉开了序幕,7月15日,平安基金率先披露旗下30只基金的二季度报告,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持仓方面,已披露的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多数产品权益类持仓比例出现了小幅上调。就后市走势而言,部分基金经理持谨慎乐观态度,更为看好盈利成长明确的消费类龙头公司。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权益类持仓比例方面,尽管二季度股市低迷,但平安基金已披露的11只主动管理型偏股混合基金(份额分开计算)中,却有6只产品的权益类持仓比例较一季度有所提高。

具体来看,权益类仓位比例提升较为明显的产品为平安盈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由一季度末的3.23%提升至62.63%,记者发现,该基金权益类持仓比例大幅提升,与二季度产品转型不无关系,此前该基金为一只保本基金。此外,平安鑫享混合A/C,也从一季度末的8.98%提升至二季度末的17.21%。另外,平安新鑫先锋A/C的仓位则由一季度末的63.14%提升至二季度末的73.14%。

不过,也有部分偏股混合基金权益类持仓出现小幅下调,如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的权益持仓由85.64%降至71.47%。

从持有人结构上看,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平安基金披露二季度报告的30只产品中,有多达20只存在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超过20%的情况,占到总数的66.67%。其中,平安惠享纯债、平安合正定期开放纯债、平安MSCI中国A股低波动ETF等产品的单一机构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更是超过90%。

众安保险难安

顶着“三马”光环而生、身披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铠甲、以保险科技第一股登陆H股……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保险”)在拿下了诸多令旁人艳羡的“第一”后,却遭遇了净利加速下滑、高管纷纷出走的境遇。7月15日,针对媒体报道的众安保险CEO陈劲正在办理离职手续一事,陈劲本人给予否定回应。可无论陈劲是去是留,今年以来众安保险的确在经历一轮人事震荡。此外,在此前现金贷搭售保险的调查中,多位消费者投诉称贷款时默认“购买”该公司保险产品。

多名高管出走

7月15日,有媒体报道众安保险CEO陈劲已经提出离职。公开资料显示,陈劲自2014年6月加入众安保险,出任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及公司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此前,陈劲曾担任招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副总裁,招商基金副总裁等职务。

虽然陈劲正面辟谣,但是众安保险的正确在经历一轮人事调整期。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该公司昔日的多位干将已先后离职。

继业务条线多位高管相继离职后,4月中旬,众安保险原副总裁吴逖将加盟合众财险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商报记者核实后获悉,吴逖确实将出任合众财险总裁一职。

随着吴逖的出走,短短两个月时间,众安保险连失三员大将。对于高管的接连出走,有分析人士表示,人事变动或与该公司经营压力增大、战略布局相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向楠表示,互联网保险在初期的研发、推广、客户培育成本较高。同时,近几年车险和意外、健康险在互联网渠道贡献的保费大幅下降,效果发挥不足。此外,互联网险企还面临业务件数多,但多数业务无法形成消费闭环,没有与强大股东的核心资源充分结合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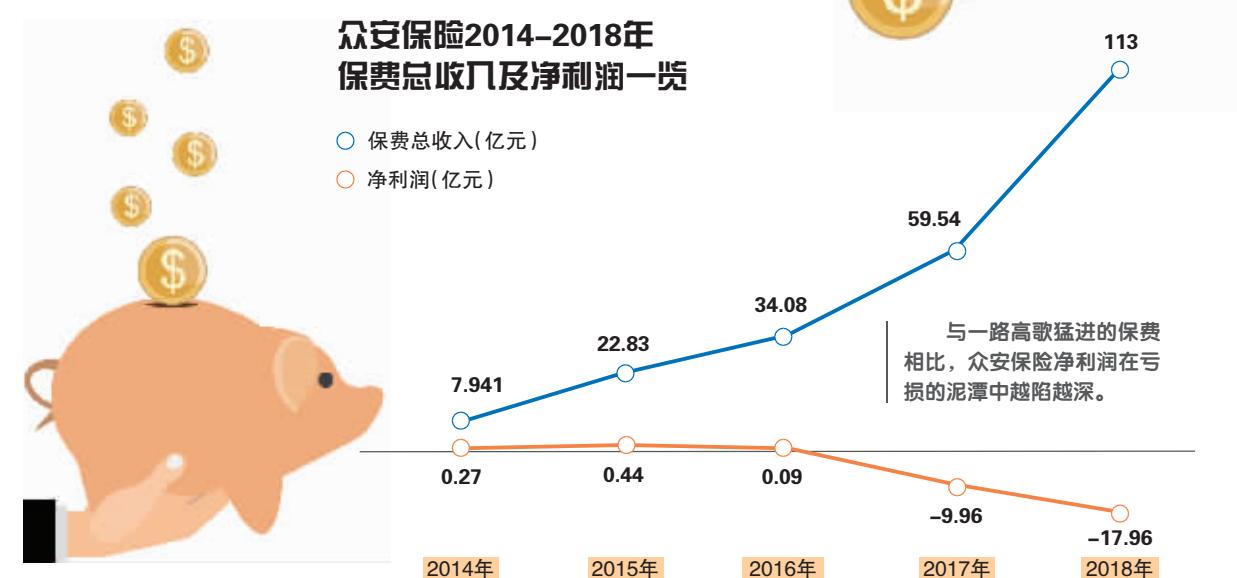
而对于高管接连出走,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众安保险,但截至发稿,该公司并未回复。

净亏损加大 股价一路狂跌

曾经风光一时,如今却面临亏损不断、高管接连出走的窘境。

数据显示,众安保险2014-2018年的保费总收入分别为7.941亿元、22.83亿元、34.08亿元、59.54亿元、113亿元。

而与一路高歌猛进的保费相比,众安保险净利润在亏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2014-2016年,该公司净利润分别为0.27亿元、0.44亿元、0.09亿元。但从



2017年开始,众安保险进入亏损期且亏损缺口持续加大,2017年、2018年分别亏损9.96亿元、17.96亿元。

对此,众安保险将亏损加大的原因归于受承保增亏、投资收益下滑、科技输出拖累。一是承保业务板块,在综合成本率从2017年的133.1%下降至2018年120.9%的情况下,承保增亏3.057亿元;二是受A股市场低迷影响,权益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显著低于2017年水平,2018年总投资收益同比减少3.32亿元;三是由于科技输出业务尚处于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阶段,净亏损同比扩大3.443亿元。

的确,在科技输出业务上,众安保险下了不少“血本”。数据显示,2018年众安的科技研发投入达到8.5亿元,占总保费的7.6%。

不过,一位保险公司高管指出,保险科技输出业务尚处于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阶段,未来,如何将科技输出融入于保险核心系统之中,以提高保险流程效率还待考。同时,如何解决自身盈利能力欠缺及行业发展缓慢等多方面的挑战也值得关注。

业绩下滑的同时,股价也接连下滑。截至目前,众安保险的市值为293亿港元,股价为每股19.92港元,相较于59.7港元的发行价跌幅高达66.6%,与股价巅峰时的97.8港元相比已跳水近八成。

彼时,作为互联网保险第一股,众安保险在2017年上市之初曾大开造富模式,上市首日的股价最高涨了近18%,市值也一度达到近千亿港元。

深陷现金贷强卖保险风波

最近一段时间,现金贷平台“强售”保险产品备受诟病,不少借款人投诉称借款时“被保险”。

7月4日,张力(化名)在聚投诉平台发帖投诉称,在小赢卡贷贷款时,被默认购买了众安保险的产品。

根据张力贴出的图片,合同借款金额1.5万元,分12期偿还,其中第一期还2181.61元(包含1656.16元本息和525元保费),自第二期开始每期还1656.16元。

此外,聚投诉平台还显示,岳先生于2018年7月10日在众安保险旗下的点点平台借款1.4万元,分12期偿还。最近,他发现当时贷款时被强制买过众安保险,保费2340.38元。

岳先生投诉补充道,根据《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第五条规定:“不得借贷搭售。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在发放贷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时强制捆绑、搭售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众安保险,但截至发稿,该公司未予以回应。

事实上,作为发力点之一,针对消费金融场景生态,众安保险此前推出了信用保证险、花豹VIP、马上金、马上花等产品,并于2017年11月成立了重庆众安小贷公司。

数据显示,众安保险旗下的众安小贷2018年营收2107万元,净利润704万元。其中,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达1988万元。

不过,众安保险旗下的众安小贷进入消费金融市场的时间恰是行业监管趋严的开始,备受合规等因素的限制,互金平台的存活率正直线下降。同时,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表示,随着市场逐步规范,非持牌机构在监管的要求下将逐步退出市场,持牌机构还存在一定发展空间。另外,小贷公司的发展还取决于是否能够与股东的资源相结合,是否能利用好股东的场景、数据、客户、资金等因素。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李皓洁

S 重点关注 Special focus

小贷行业 低沉期”

延续2018年的颓势,2019年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行业仍处于“低沉期”。7月15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开年至今仅有55家小贷公司成立,这一数量较2018年同期新增的64家再次缩减,不足2017年同期新增数量的一半。随着潜在风险的加速暴露,监管机构也在逐步加大对这类企业的管理力度,小贷公司正经历着“生死劫”。

开年以来仅10家公司“开店营业”

小贷公司正迎来优胜劣汰的高峰期,7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天眼查披露的信息不完全统计后发现,排除已注销和正在注册的公司,2019年开年以来新成立的小贷公司数量急速缩减,仅有55家公司成立,其中10家公司经营状态为“在业”,45家公司经营状态为“存续”。这一数量相较2018年同期有所下滑,不足2017年同期新增数量的一半。

时间线拉长来看,2018年同期,新成立的小贷公司共有64家,其中经营状态为“在业”的公司有13家,经营状态为“存续”的小贷公司有51家。2017年新成立的小贷公司共有123家,其中经营状态为“在业”的公司有24家,经营状态为“存续”的小贷公司有99家。

激活民间资本、扶助“三农”和小微——曾被寄予厚望的小贷公司每况愈下,除了新增小贷公司数量急速缩减外,新三板挂牌的33家小贷公司日子也并不好过,据麻袋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33家小贷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合计108.1亿元,同比下降2.7%。发放贷款及垫款平均值为3.28亿元,2017年该值为3.37亿元。从近

五年的财务数据看,33家小贷公司中,2017年实现盈利的有32家,2018年下降到28家。

在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看来,影响小贷公司发展的主因,是其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其资金来源及融资额度等面临诸多限制,进而导致经营过程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其次是小贷公司客群以“三农”和小微企业为主,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逾期上升,计提的资产损失准备相应大幅上升,严重侵蚀了小贷公司的营业利润。

多地小贷公司迎整治“风暴”

随着小贷公司风险加速暴露,监管机构也在逐步加大对这类企业的管理力度。今年以来,包括吉林省、河南省、四川省、山西省在内的多地都开启了对小贷公司的整治“风暴”。

7月12日,江苏省金融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作的通知》,从审批管理、股东资质、外部融资、实际利率、贷款管理、不良资产清收、业务合作、涉案涉诉等多个方面重点排查小贷公司的违规内容。

这也是继2018年12月,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宣布终止全省89家小贷公司相关经营资格后,该地区针对小贷公司专项整治的又一举措。除了江苏省外,多地小贷公司也出现被限期整改、取消业务资格的现象。4月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透露,将省内110家小贷公司列入限期整改,304家小贷公司列入清理整顿,预计到2019年底前,吉林省小贷公司数量将压降至420家左右。根据央行此前公布的数据,吉林省2018年末小贷公司数量为488家,这意味着2019年将关闭68家左右。1月8日,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融资担保处连续发

布13则公告,取消18家小贷公司的试点资格。

在经济增速下行和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趋势势头不减的冲击下,小贷公司发展明显后劲不足,在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看来,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影响是小贷公司不良率攀升,利率下降;金融科技的影响是巨头下沉,模式变革。双重影响交织下,龙头尚可勉强应付,中小贷公司则渐渐跟不上节奏。

鼓励并购重组

在数量缩水、贷款余额负增长的状况下,小贷公司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在王诗强看来,首先,在对小贷行业进行清理整顿和风险出清后,监管部门应对传统小贷公司的法律地位予以“扶正”,在中央统一政策加强监督的前提下按属地原则进行监管。其次,给予小贷公司的涉农、涉微贷款收入更大税收优惠和政策补助,鼓励小贷公司在“三农”和小微贷款领域与其他金融机构错位竞争。他进一步指出,当前,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依然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建议监管出台政策时,不要一刀切。对于部分欠发达地区,对合规经营的小贷公司给予更多的融资支持。

“小贷公司大型化,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再深入一层看,小贷公司大型化也是科技重塑金融的必然要求。科技打通了时空界限,消解了小贷公司‘小而美’模式的生存空间,大型化叠加科技化,是小贷公司的一条可行出路。”薛洪言强调:“站在监管机构的角度,可出台鼓励小贷公司并购重组的政策指引,疏通小贷公司的退出渠道。”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